



摇晃的天目山

天目钱塘抗战八年纪实

◎ 张白怀 编著

YAOHUANG DE TIANMUSHAN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摇晃的天目山

——天目钱塘抗战八年纪实

◎ 张白怀 编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摇晃的天目山:天目钱塘抗战八年纪实 / 张白怀编
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308-15180-1

I. ①摇… II. ①张…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杭州市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0488号

摇晃的天目山——天目钱塘抗战八年纪实 张白怀 编著

责任编辑 叶 抒

责任校对 张一弛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18千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180-1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 88925591; <http://zjdxcsb.tmall.com>

YAOHUANG DE TIANMUSHAN

拨开天目烽烟的迷障

——《摇晃的天目山》读后

张抗抗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奋起、救亡图存的伟大壮举。中国作为二战东方主战场、中美英苏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巨大的牺牲牵制并消灭了大批日本侵略者，赢得了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的敬意。

长篇纪实文学《摇晃的天目山》，记述了1937—1945年间，浙江天目山南北及杭嘉湖地区抗日斗争的真实状况。该书在抗战胜利70周年出版，为东南前哨的抗日战争史填补了一大空白，弥足珍贵。

作者张白怀是一位92岁的高龄老报人，浙西抗战的亲历者，是我的父亲。他年轻时在天目山《民族日报》工作，作为特派记者往来于游击区实地采访，结识了一些抗日游击队的著名人物，如书中所写的郎玉麟、李泉生、朱希、鲍自兴、黄八妹等，曾在报上连载了《水乡吟》《海北敌后来去》等长篇通讯。

天目山的云雾、杭嘉湖的硝烟与血腥，是我父亲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

光阴荏苒，大半个世纪过去，我父亲仍然无法忘记当年亲历亲闻亲见的一切。父母离休以后，20世纪90年代我曾陪同他们重访西天目。2010年，父亲以87岁高龄编选出版了他与我母亲几十年的作品合集《双叶集：文学之梦与人生笔记》之后，书写编著这部天目山抗战史，就成为父亲晚年最后一件未了的夙愿。

一位九旬老人心心念念想写的东西，一定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了。

一位九旬老人要完成自己的心愿，需要付出比常人艰难数倍的努力。

父亲常年腰椎疼痛无法直坐，他只能把稿子铺在一块小木板上，木板置于膝盖，抵靠在沙发上写作。一日里断断续续写下几百字，一字一字每日不息，写满了一摞摞厚厚的稿纸。他在年轻时就注重笔记和史料搜集。如今，岁月清除了浮面的表象，从记忆深处凸显出珍藏的往事。天目山因东、西峰顶各有一池清泓，宛若双眸仰望苍穹，故而得名。有时觉得，天目亦如父亲年轻时那双黑亮的眼睛，穿透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烽烟迷雾，在晚年依然闪烁着清澈的光泽。

作者将该书定名为《摇晃的天目山》，蕴有深意。

天目山位于浙江临安境内，浙、皖毗邻地区，古名浮玉山。1956年被国家林业局划为森林禁伐区，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6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MAB)网络，成为世界级自然保护区。天目山地貌独特，地形复杂，峭壁突兀，怪石林立，峡谷众多，自然景观优美，堪称“江南奇山”，亦被称为“华东地区古冰川遗址之典型”。特殊的地形和悠久的佛教文化，名闻遐迩的“天目山大树王”和古老丰沛的森林植被，使其成为世界的一大奇迹，是我国亚热带林区高等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天目山呈西南—东北走向，是太湖水系和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山地呈中心—深谷景观，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峰有10余座，山地两侧多低山丘陵宽谷景观。

1937年抗战初期淞沪大血战80天后，日寇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等地登陆。国军向天目山地区移动。但由长兴窜犯泗安、广德的日军一个旅团，竟尾随向天目山追击。告岭为天目山一部分山峰的名称，顶界线称为羊角岭。告岭南面下坡途中有百丈坑、一线天等险峻地段。如果告岭、羊角岭天险不守，日军即可越过天目山，直下於潜、分水、桐庐，浙赣线将可能沦于敌手。告岭之得失，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重大。国军当机立断回头强烈反击，迫使日军反追为退，受阻于天目山屏障。这是天目山在抗日烽烟与战火震荡中，第一次“摇晃”。

第二次“摇晃”发生于1943年10月，日军以一个联队加山地装备特种部队，对天目山地区发起进攻，满以为天目山唾手可得，结果又一次被国军击败溃逃。1944年秋，日军为防止美军在浙江、福建方向登陆，确保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安全”，先后占领温州、福州等要地，控制了浙闽两省沿海地区，国民党军纷纷西撤。中国共产党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东南沿海抗日斗争，准备实行战略反攻的指示，新四军粟裕司令员率第一师渡江，在浙江长兴建立苏浙军区，确定了向天目山敌后部队的部署。而国民党顽固派连续调集重兵企图聚歼，新四军部队被迫进行了三次反顽战役，巩固并扩大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巍巍天目山，在战火硝烟中又一次成为历史风云的见证——“摇晃”一词，实际上隐喻多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国共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奉命北撤。天目山经历了第三次“摇晃”之后，国民党政权实际上也开始“摇晃”，终至四年后倾覆……《摇晃的天目山》有一段“尾声”：我们看到新四军北撤后的“留守处”，如何受到国民党的残酷反扑和镇压，国共全面内战的前景令人触目惊心。但是，一场向光明、向自由、向胜利，为不

同的政治理念而进行的斗争，继续着、继续着……据此不难理解，所谓天目山的“第三次摇晃”，明确隐喻了国民党政权的“摇晃”，这是作者历经了大半个世纪浓缩、沉淀的特殊历史记忆。

《摇晃的天目山》一书的显著特点是：以客观真实而复杂的人物、事件，揭示出浙西地区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该书结构分为上、中、下三部——上部“不屈的杭嘉湖”，记述杭嘉湖地区民间抗日武装的成长壮大；中部“东南前哨”，描述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天目山地区军民抗日武装的战斗历史；下部“摇晃的天目山”，重点讲述了国共斗争中浙西国民党政权溃败的结局。全书故事密集、史料翔实、人物生动，思想性与可读性相得益彰。

抗战时期的杭嘉湖游击区，地方势力割据、土匪地痞各霸一方，曾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混沌世界。该书以民间抗日爱国志士为主线，写出了不同阶层的人物，在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勇于献身、不惜牺牲的精神气象。中共浙西地下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全面展开活动，这是贯穿全书的副线。特别是省、县“政工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聚拢各方力量参加抗日斗争，创下了克敌制胜的种种奇迹。书中细致描述了一批进步青年，在抗战的腥风血雨中，从浑噩到清醒，追求真理、历练成长的心路历程。该书还用了相当篇幅，记述了国民党正规军在天目山第一次、第二次保卫战中立下的赫赫功勋。在杭嘉湖游击战中，国军参与了反扫荡、反流窜、反清乡活动，国民党第三战区曾派遣挺进纵队，统一整编良莠不齐的“游击队”，对敌伪据点构成了相当威胁。书中对当年号称“天目王”的国民党省政府委员、浙西行署主任、反共老手贺扬灵的记述，是全面而客观的。可以说，《摇晃的天目山》是目前已经出版的历史读物中，比较重要的一部记录了东南抗日前哨国共两党从合作到斗争的珍贵文献。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对20世纪上半叶那种复杂对峙、进退反复的时代背景，已是知之甚少或漠不关心。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对于抗战历史的了解，大多来自于“文革”前的教科书及小说、电影作品。有关抗战，我们曾被灌输了太多的宏大叙事和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观，对战争真相的了解，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战争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在摧毁性的炮火与屠杀面前，卑微渺小的生命，可因贪生而成为汉奸，也可因奋起抵抗而流血牺牲。重要的并不是记忆或遗忘，而是什么样的记忆和遗忘。

历史记录真相被屏蔽，残缺或是曲解，比记忆的丧失更为可怕。

《摇晃的天目山》有其独特的史料文献价值。我们不再需要重复同一种模式的记忆，而应当开掘更多个人化的历史记忆——有如天目山被誉为“活化

石”的野生银杏；有如高达 56 米被称为“冲天树”的天目山金钱松；有如被称为“地球独生子”、全球仅天目山遗存的 5 株稀有天目铁木；有如天目香果树、领春木、连香树、银鹊树等均为珍稀植物，被后人精心呵护。

今日的天目山，已是著名的风景胜地，当年被日军飞机炸毁的禅源寺早已修缮一新。然而，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烙刻着日本侵略者当年犯下的滔天罪行。在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记住日军侵华时期，中国民众生命财产蒙受的巨大损失，记住丰饶的杭嘉湖地区的人民曾经遭受的痛苦与摧残，并永远记住所有那些为抗击侵略者而英勇献身的人们。

2015 年 6 月 8 日北京

楔子

今天的天目山是重要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与抗战时期的老友相见，总离不开天目山的话题。当年号称“东南抗日前哨”的天目山，在我们心中是一种伟大坚实的象征，是我们青年时代的寻梦之地。它不是一座望之弥高、难以攀登的山，而是可以拾阶而上、古木森森、芳草遍地的使人心旷神怡之山。晋代诗人郭璞有诗：“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天目溪向北倾注苕溪而进入太湖，向南倾注分水江而聚合富春江、钱塘江。天目山对杭州人是永恒的，对富饶宁静而美丽的杭嘉湖平原水乡是永恒的。

著名画家叶浅予诗句：“留椿屋下说风流，蟠龙桥头话烽烟。”天目钱塘的抗战故事，困扰我许多年了。岁月蹉跎，命运使我白白耗去了半个多世纪的光阴，今日两鬓如霜，要写出那十分遥远的故事，真是如同一个跛足老人企图登上天目山仙人顶一样是个梦想，几乎是绝不可能的。

我重新萌发一种难以压抑的创作欲望，源于非常意外地收到的一封信，这封信不是写给我的，是请我代为转达的。这封信以一种近似震撼的力量，使我又惊又喜地好像看到天目山顶上早已枯竭的“天目”双泉涓涓而出，它使我心中埋藏的那些人和事重新活跃起来，以致一发不可收拾……

这封信写道：

郑小杰先生：

请原谅我冒昧地打扰你。我是贺扬灵先生的女儿，我想收集父亲的遗作，为此给你写信。父亲在1947年7月病逝，时年47岁，当时我11岁半，跟着母亲卢继芳女士在南京念中学，之后上北京的中国地质大学，学地球物理勘探，毕业后就一直在北京的中国地质研究院做科学研究工作。1985年回到南京，在现在的华东石油地质局工作。今年我近60岁了。

今年夏天我应实用科学院的邀请去美国，参加7月上中旬在科罗拉多州 Bonloler 城举行的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大会。会后我参观了一些地方，在华盛顿的“国家航空局与空间博物馆”中，我看到“轰炸东京（Tokyo Bombing of Tokyo）”版面上杜立特将军与我父亲等三个中国人的合照（在天目山潘庄）。

我少年丧父，对父亲知之甚少。母亲也说不出多少，因为她不参与他

的工作和活动。在80年代,江西永新县编县志的人物传中要列入“贺扬灵传”,要我母亲提供材料,为此我曾帮她在图书馆查书目,但据母亲所言,父亲曾有《杜立特降落天目记》一文,却至今没见到。近日查到郑先生在父亲去世时所写的纪念文章《回忆浙西工作——纪念贺先生》文中提到了父亲这篇文章,所以我想也许郑先生知道该文的内容和发表的时间。我在杭州听说郑先生保存有《民族日报》复制件,不知上面有无父亲的文字和遗墨?……

我母亲已于1992年5月去世。

贺绍英敬上

1995.11.7

这封信是通过住在上海的一位忠厚长者辗转传递到我手上的,因为我与定居美国的郑小杰先生有信札往来,我把信的原件寄给去美国夏威夷颐养天年的郑先生——85岁高龄的前《民族日报》社长。

随后,贺绍英接到了美国郑老先生的复信。郑老先生十分惋惜地说,他保存的那份《民族日报》微缩胶卷,已在几年前捐赠给台湾的“中央图书馆”,他建议贺女士去大陆的图书馆再找找,应该是不难找到的。如此贺绍英和我通了几次信,我由此得知她是一位在地球物理勘探研究上有相当成就的学者。她跑过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跟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她说自己很幸运,能够把青春和才华献给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工作。她同时谦虚地说,她的经历是一帆风顺的,只是不断地工作、学习,思考和创新,个人的知识也多局限在专业工作的领域之内,同社会大众接触较少,对整个大时代的发展变化,只有一点非常浅薄的书本知识。在一封信里,她提到了几位曾在她父亲手下工作过的同事的名字,其中有些是我的朋友,都是当年天目山的进步分子。贺绍英希望我能为她引荐一下,以便她向这些前辈请教,借以了解其父亲当年的实际活动。我知道这些同志对她父亲的政治态度,以星散各地、年高体弱为由推却了。

特别让我意外的是,她说有一个哥哥在杭州,名贺仁福。当年我知道贺扬灵有一个儿子在江西永新老家,是前妻所生,他高中毕业时从江西吉安到过天目山,后来到皖南屯溪上大学去了,相隔的数十年间天翻地覆,如今听说他在杭州,不免有点惊讶。一个国民党政府高级地方官员的儿子,在急风暴雨的大变革时期,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度过阶级斗争的30个春秋,也许有点传奇色彩。

此后,我同贺仁福联系上了。开始,我同他多次电话相约,都因雨雪天气

而将约期一改再改,我甚至等得有点不耐烦。有一天家里电话铃响了,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我是贺仁福。现在我在一个朋友家,离你这里很近,我马上过来。”我们见面时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没有拘束。坐在我面前的贺仁福,相貌端正,敦厚朴实,举止从容,完全是一个老教师的模样。我记得1941年11月,我们上海沦陷区“孤岛”五百爱国青年回归自由祖国时,在天目山受到热烈欢迎,40岁壮年的原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热情洋溢地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他身材不高,穿的是灰布中山服,脸有异相,声音洪亮,热烈地挥着拳头激情高喊:“……你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我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沦陷区出来的少年,耳边听着,心里热热的。后来抗战胜利前一年,我辗转于东南前哨各地,再没有遇到另一个如此刻意煽情的演说家。尽管贺扬灵作为一个国民党地方高层反共分子的身份是历史事实,但某些文史资料把贺扬灵形容为“蜂目豺声”则是脸谱化了的。

我同贺仁福交谈时,有意把话题引向他在1949年解放后的遭遇,因为我个人的痛苦经历使我脑海中映现的是阶级斗争,是惊涛骇浪,我期待听到他讲述自己生命之舟的沉浮,以及他又是如何到达今天宁静的港湾的。

1945年秋季,贺仁福考入设在金华的国立英士大学经济系。其父亲曾要他去投考中央政治大学,可是他对政治没有兴趣,违逆了父亲的意思。这一点对他的命运非常关键,实际上决定了他后来的进退和生存。英士大学当然是一所保守的大学,随着国共内战形势的发展,校内也表现为左派学生和右派学生的严重对立,当时的贺仁福不介入政治斗争,他自己说是“对国民党没有好感,对共产党也没有恶感”。贺仁福是贺扬灵前妻所生的儿子,从小到大的在江西老家读书,他说自己的志趣在经济,不在政治,因此他的暑假、寒假不是去南京,而总是在上海度过的。他有一个堂叔,比起父亲他更喜欢和堂叔接近。堂叔是中央信托局副局长,住的是法租界上一座花园洋房,对这个学经济的侄儿也寄予厚望,常常和他一起谈论经济问题,当时国民政府经济金融的局面濒临崩溃,堂叔权力有限,束手无策,对前景是悲观的。

1948年春夏之交,英士大学学生会举行民主改选,左派学生和右派学生竞争激烈,两派旗鼓相当,中间派推出的候选人是贺仁福,竟“无心插柳柳成荫”,当选为学生会主席。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大学里因“迁校”与“护校”之争,出现三个立场不同的“应变委员会”,一个是学校行政的,一个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一个是学生的,贺仁福属于学生护校的一派。1949年3月底,他到上海堂叔家,堂叔正准备南迁,堂叔对他说:“你跟我一起走,我们有机票的。”贺仁福心想,形势面临着大变动,确实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反正

是一个普通学生，无党无派，何必跟着逃亡？他对堂叔说：“你们一家人，负担够重了，再拖上一个我吃干饭的，不行。我还是回到学校里，看情况再说。”堂叔也就不勉强了。

革命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势汹涌而至，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金华不久也解放了，随后杭州成立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浙江分校，招收学员，英士大学几百名学生涌向杭州，报名进入革命大学接受洗礼，贺仁福没有犹豫，随大流成了一位大学毕业生学员，无疑他的选择是明智的，也是他死于1947年的父亲万万意料不及的。贺扬灵1924年由国民党中央委员段锡朋介绍参加国民党。段锡朋是AB团的组织者，贺扬灵曾是其骨干成员之一。国共斗争过程中，父子殊途的事倒并不鲜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政治运动不断，贺仁福这样的家庭背景，是如何走过这段历史的呢？对此我非常好奇。

我问贺仁福：“‘革大’把你分配去哪里？”贺仁福回答：“参加农村工作队呀，在杭县。”问：“干什么？”答：“开始是发动群众民主建政、反土地隐瞒、反霸，再就是搞土地改革，初期的农村工作我全参加了。后来就派我到中学教书。一次一次政治运动，首先就是交代我的父亲，但是我从小到大没有跟他在一起，我的学生生活也很清白，一个个关卡都让我闯过来了。”听他这样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有这么简单。我笑着说：“也许你的名字取得好吧。”他说：“名字是祖父取的。”

事实上，一切并没有这么简单。经过进一步深谈，我知道了更多的事实。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农村工作队完成任务后，他原分配在一个大镇政府部门工作，不久就调去当中学教师，他教过语文、历史、地理，最后是英语。1955年肃反审干，他当然是重点对象。不妨想一想，一个国民党重要分子的儿子，一个大学学生会主席，一个放弃叔父给的逃难飞机票而留在大陆的人，在运动中能轻易通过检查？贺仁福说自己不喜欢政治，那时的政治就是阶级斗争，从他填写第一份干部登记表开始，就出现了一连串的问号。你是某某人的儿子，某某人是国民党CC派反共老手，你会不知道吗？你说的在江西读书，同父亲很少在一起，这怎么可能？你不是也到天目山了吗？你读书不是用你父亲的钱吗？你说你同父亲不接近，同堂叔接近，你堂叔是什么人？他不就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家的走狗吗？还可能是个特务。你说二十几岁的你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三四个月，就算是这样，但时间长短有什么关系？你总不能说你不是某某人的儿子！你说你同继母卢继芳的关系不好，这不可信，你不是住过杭州白马寺巷卢继芳的房子吗？这房子是卢继芳用私房钱买的，你同继母关系不好，她会让你住？你继母卢继芳的两个胞兄弟也算是你的舅舅呢，他们

不是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吗？你怎么想？你有没有向人民政府检举过他们的罪行？在大学里你是学生会主席，参加应变组织，怎么自己跑到上海去了？去干什么？你不去台湾留在大陆，是不是接受潜伏任务？是你叔叔给你布置的任务吗？……为了弄清贺仁福的政治面目，审干部门搞外调不知耗费了多少时间，跑了多少地方，结果是一无所获，总算在档案袋里留下几个字：“内部控制使用”，这就是结论了。贺仁福自己也没闲着，解放前他在英士大学是个名人，从历次政治运动到“文革”，一次次数不清的人对他外调，上至教务长、系主任、教授，下至一般小职员，同学就更多了。这样的折腾也有好处，人事部门终于承认贺仁福的问题基本上搞清楚了，他是一个不愿跟国民党走，自愿靠拢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是团结对象。“文革”结束后，贺仁福被任命为中学副校长，参加民主同盟，继而成为杭州市政协委员。这时的贺仁福五十多岁了，他可以对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无辜受伤害、受打击的同事、同学友好而心平气和地说：“怨气冲天有什么用？今天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老是想着那些不愉快、受委屈的事情干什么？让过去的永远过去，向前看吧！”

看来他是一个比较豁达而务实的人。

听他讲述的时候，我心里想：这个时代是聪明的魔术师。贺仁福舍弃政治而醉心经济，也正是政治使他与经济无缘，却让他在纷乱中得以安身立命。风暴消敛，尘埃落定，他享受离休干部待遇，至今年过七十，还在一所业余补习学校当校长。步入晚年，他的心是宁静的。我记得他这样说过：“说实话，我个人怎么样倒无所谓，共产党最终还是实事求是，对我个人还是可以的。可惜的是十年折腾，国家发展被耽误了。”——这是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间时常听到的感慨。

话题又自然地回到贺扬灵的死因上，贺仁福说：“1947年7月，听说父亲身体不好，我专程去南京探望。父亲一向较胖，那几年政坛失意，情绪很差，我见到他时，他的眼圈发黑，问他感觉如何，只说有时头晕，身体乏力。问看过医生吗？说是没有。继母说他不肯就医，怕花钱，我想这样不行，向他的秘书来逸民提出找医生来看，开了处方配药服用。那时父亲在南京住的地方狭小，晚上我同他住在书房里，服药三天没有起色，第三天夜间便出现脑出血，昏迷不醒，去世了，年仅47岁。”一个忠于国民党政权的高级官员如此终结，也足以反映这个政权走向末日前夕的情景。

我忽然想起过去听到的关于贺扬灵的传说。贺扬灵有相当的国学修养，不仅发表诗词、书法作品，还特爱收藏古典字画，当年报纸上报道过他在天目山举办的一次文物展览，当时吸引了当地的文人雅士。我问贺仁福：你父亲喜

欢收藏名人字画，留下来了一些什么，你看到过吗？他回答说没有。我对贺仁福讲了一个听来的笑话：“你父亲两次到绍兴当‘父母官’，第一次在战前，第二次是抗战开始到1939年初，名分是三区专员兼绍兴县长，其后就以省政府委员调天目山任浙西行署主任。他搜罗字画文物不遗余力，绍兴有一位姓杨的收藏家，藏有一幅查士标的手卷，你父亲想得到它，因索价高昂，未能成交，他到天目山后念念不忘，又写信给后任县长请他帮忙磋商价格。有一天绍兴县政府收到一份来自浙西行署的电报，大意是：‘查卷速送浙西，款请代垫。’县政府主任秘书是个酒徒，当时正酩酊大醉，见电文中有‘查’‘送’‘垫款’字样，不假思索，提笔在电文上批：‘拟交警察局会计室会同办理。’县太爷是个糊涂官，看公文照例不细察内容，电文角上批道：‘如拟。’电文送到警察局，局长摸不着头脑，遍查档案，不知所从，只好送给会计室，加上‘请会签意见’的条子，会计主任莫名其妙，不知耽搁多少天，最后只好拿着电文去请示县太爷，才弄明白是贺扬灵要买杨某的查士标手卷。后来这手卷是否到贺扬灵手中不得而知。不过，这个糊涂县官倒还是官运亨通，不久便升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去了。”贺仁福笑起来，随后说：“据我所知，我父亲没有多少钱，如果平时有点积蓄，他不会误了治病。”我问：“你是否知道他手上收藏什么？”贺仁福说：“这个我可没有注意。但是妹妹贺绍英对我说过，解放后继母主动把一批古字画交给人民政府，也许公安或文物部门有收据吧，我不清楚。”贺仁福对父亲政治生涯没有表示什么看法，但是对经济生活方面，他的判断是对的。贺扬灵生长于井冈山下的江西永新县，早期就确立反共思想，这是他的人生定线，但抗战胜利后，贺扬灵的家庭生活状况证明他不是贪官污吏。据说他到南京时很拮据，其部属瞒着他去找一个在上海做寓公的叫张鹏飞的人，此人抗战时是杭嘉湖游击区一个游击大队长，当年的“烧毛党”，是发了大财的。其部属怕张鹏飞不买账，还找了张的表弟一起去说，他总算勉强解囊。这件事后来还是让贺扬灵知道了，使他直摇头叹气。

1948年11月，杭州当代出版社印出《贺扬灵先生纪念册》（当时我作为一个中共地下党员任《当代晚报》总编辑，开展秘密宣传和策反活动），这本纪念册由陈立夫作序，我阅后做了一些笔记。陈立夫对贺扬灵的评价是“党失斗士，国丧良才”。他写道：“贺培心行略，历处政治尖端，一时毁誉交集，唯无论为敌为友，率皆重其人。……余心之悼，岂仅僚谊而已哉！”

陈立夫的所谓“毁誉交集”，指的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对贺扬灵的非议：1945年新四军在长兴建立苏浙军区，纵横天目南北，国民党正规军及地方团队七八万人败于新四军二万人之手，使军方恼羞成怒，对贺扬灵过去使用、纵

容共产党人大肆攻击。1945年9月3日贺扬灵作为浙江省政府行辕主任到富阳县新乡宋殿村(后改受降村)参加驻杭日军受降仪式后,这位抗战时期的“有功之臣”,期待的是出任杭州市长,但结果落空,出任杭州市长的是蒋宋美龄的留美同学周象贤。贺扬灵在杭州赋闲达半年多,依靠政治后台CC派的陈立夫,才去南京就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第五处处长之职。这个结局,是他自己没有预料的。

我要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天目钱塘真实而又复杂的故事,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掌握它。活着,以跨九之年爬我的格子……

我将摇摇晃晃地走向东南抗日前哨天目山,永远巍然屹立的“大树王国”天目山!

上部： 不屈的杭嘉湖